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青年朋友们，今天要向你们介绍的是中国近代维新变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唐才常。提起他来人们也许有些陌生。他不如同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或者谭嗣同那样声名卓著，但从倡导湖南维新到领导自立军起义，他的一生也是轰轰烈烈，可赞可叹的。

唐才常与谭嗣同都是湖南浏阳人，两人以推动湖南维新而名重一时，被人尊称为“浏阳二杰”，唐比谭小2岁，两人不仅志趣相投，就连脾气都差不多，都是铁打的硬汉。谭嗣同在北京就义时高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令人回肠荡气。唐才常死于武昌，临死留下绝命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荒丘。”追随谭嗣同亡魂西去，实现了两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他们都是为了挽救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亡国灭种而英勇牺牲的爱国志士，是无数先烈中的一员，他们不屈不挠追求救国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下面将介绍唐才常烈士的一生事迹以飨(xìng)读者。

一、浏阳二杰

唐才常字伯平，号纮(hóng)臣，也号佛尘，1867年出生于浏阳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

唐才常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由一个中世纪的封建大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出中世纪，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渡时期。经过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割地赔款，被迫开放了许多沿江沿海地区作为通商口岸。马可波罗所提到的遍地都是黄金的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帝国似乎正在层层撩起它的面纱。西方列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配合着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的勾当，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的轰炸。

中国人民并不甘心沉沦，从列强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在武装反抗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了学习西方知识、技术的新尝试。

魏源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胆设想，就是说要学习外国人的先进技术来对付外国人。多年以后，冯桂芬、郑观应等人又从自己的实践出发，提出“采西学、制洋器”。这个思想在当时愚昧自大的社会中如清风拂面，教人清醒。清政府也从巩固自身政权的目的出发，在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对外交涉，并开始了著名的“洋务运动。”

唐才常就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20岁之前，他和同代人一样，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耗费才智，如他自己后来自嘲的那样“低首催眉，钻研故纸”。少年时代，唐才常已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深沉好学”且成绩突出，因此在1886年19岁那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都得第一，连中三元，一时在浏阳传为美谈。这次考试，唐才常

¹ 魏源(1794—1857)：清朝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

冯桂芬(1809—1874)：清道光进士，他的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郑观应(1842—1921)：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

得中秀才，获得了初级功名。

少年得中，科场得意，不光是他的家庭，就是亲戚朋友也都认为孺子前程未可限量，光宗耀祖之日指日可待。但唐才常本人却并未这么想，读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为获取功名，他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他既关心个人做官的小前途，也关注着民族国家的大前途。尽管四书五经他已背得滚瓜烂熟，但却找不到怎样对付西方列强的办法，孔夫子、孟夫子的书目中只有诸侯列国而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看起来对付列强的办法在四书五经中是找不出来了，只有另想办法，但办法在哪里呢？

带着满腹的疑问，他来到了省城长沙，先后在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求学。

岳麓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一所著名学府。那里群英荟萃，从各地来的年轻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个个都是踌躇满志、意气奋发。唐才常在这里受他们熏陶也获益匪浅。他结识了浏阳同乡谭嗣同。谭嗣同是巡抚大人的贵公子，曾经历过大半个中国，可说是见多识广，他对于当前的民族灾难有着十分痛切的认识，一心一意探究能治国平天下的实学。谭嗣同十分注意从先贤王夫之以及本朝具有改革思想的龚自珍、魏源那里汲取他们的思想精华，同时他也热心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江南制造局编译局的常客。相同的志趣使他们相见恨晚，彼此互为知音。谭嗣同兴奋地说，20年来的刎颈之交，只有唐才常一人而已。他们在一起相互切磋，并发誓要学习墨子为改造中国而摩顶放踵。果然在后来的湖南维新运动中，两人并肩合作，配合默契，为改造中国而前赴后继，实现了他们读书时的誓言。

唐才常在岳麓书院还遇到了另一个浏阳同乡，当时湖南著名学者欧阳中鹄（g）先生。欧阳先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学者，他十分推崇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先生。唐才常在欧阳先生那里不仅得到今文经学的知识训练，而且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求学生涯随着唐才常赴四川而暂告结束。1892年，担任四川学使的瞿鸿禨欣赏唐才常的学识才干，特意聘请他担任子女的课业老师并且兼做瞿本人的幕僚。唐才常在四川待了一年，1893年他从四川回湖南，在返湘的途中，唐才常饱览了祖国中西部奇异峻秀的景色。长江三峡的雄奇险峻，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湘西山区如神话般变幻莫测的景致，沿途物产的丰饶，这一切都令他难忘。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所到之处社会下层人民的沉重苦难。清政府把银子都拿去作为赔款献给帝国主义了，而它的百姓却是民不聊生。壮丽的山川，苦难的人民，这使唐才常心中涌动着一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他的胸襟为之开阔，精神振奋。

1894年唐才常又考入了位于武昌的两湖书院。两湖书院是由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张之洞创办的。张之洞是清朝著名的大官，因在中法战争中“主战”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而声名鹊起，崭露头角，之后长期担任了湖广总督，坐镇长江中游地区。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用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为清王朝服务。出于中体西用的考虑，张之洞在武昌新办了两湖书院，专门培养洋务人才。书院吸引了许多渴望新知识的青年人，他不仅训练了许多洋务人才，而且也造就了一大批改良以及革命运动的先驱、领导者。如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等。

唐才常在这里学习十分努力，每次考试他都名列前茅，深得张之洞的器重。在这里唐才常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西学方面。他广泛涉猎了所能

得到的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历史的书籍。他津津有味地谈论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故事，对西方的民权学说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带着新知识与新思想，唐才常从两湖书院毕业了。这时他已 28 岁，急着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已经不想再等待，而中国也不能再等待了。

这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这次战争与以往不同的是战争的发动者不是西洋蛮夷，而是中国历朝以来的后辈学生，中国人称之为东洋矮子的小日本。可恨的是这个矮子学生毫不留情地把老师打得落花流水，由洋务派苦心经营了 30 年的中国北洋水师在黄海一战中全军覆灭。日本在战场上打败中国后，又逼迫清王朝签订了前所未有的苛刻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内舆论沸腾了。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一切给骄傲的中国人的心灵以重重一击，唤醒了中国 4000 年的大梦。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去思考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可以说甲午战争对中国的维新启蒙运动起到了一个最直接、最强烈的反面刺激作用。

唐才常虽然远离黄海战场，但也感到了这场战争带来的震动。他回忆起当时“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而在湖南也是“警报日夕数至”，使得乡民谈虎色变，人心惶惶。也正是从这时起，他痛切地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变法图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为了表示自己除旧布新、发愤图强的决心，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泚（píng pì 意为漂洗）子，以此激励自己。

甲午战争以后，唐才常从浏阳起步，开始了他贯穿终身的改良维新实践。

唐才常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欺负中国，在于他们有坚船利炮作物质后盾，而坚船利炮又是和他们所掌握的自然科学技术分不开的。因此中国要改变落后挨打的现实，就必须去学习、掌握先进的知识、技术。这种质朴的认识虽然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有人提了出来，但可悲的是在国内却得不到半点的回响，以至于与西方打了 40 多年的交道，从朝廷高官到求学少年仍有许多人不仅不知道？对手英、法、俄国究竟在地理的哪个角落，就连地球是方是圆都不清楚。人们不以这种惊人的无知为耻，反而认为时称格致之学的自然科学都是些雕虫小技，是“未议”（微不足道，琐细的议论），即使不了解也对国家大计无所损害。为了转变这种风气，唐才常、谭嗣同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上书湖南督学江标，请求将浏阳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专门教习数学、理化知识。他们设想通过办学来提倡学习自然科学的风气，等风气转变后，就可以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虚文改考学生的真才实学，将自然科学加入考试内容。一旦等学生掌握了西方的先进知识，中国何愁不能富强呢？唐才常他们将办算学馆“尊重西人之实学”与民族的前途——保种联系起来，并不遗余力把它付诸实践。算学馆将考生中热衷时务的人列为前茅以示鼓励，对那些愚腐空谈者则不予录取。这逼得考生不得不去买书、读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算学馆的这番心血没有白废取得了成效。每次考算学、洋务，浏阳的学生成绩总比其它府县的要好，每次都夺得全省冠军，这样引得其它地区纷纷效仿。西学的风气得以大张。浏阳算学馆的开办成为湖南提倡新学的起点。

在浏阳小试牛刀后，唐才常将他的目光转向了省城长沙，那里正在发生着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唐才常被深深地吸引着，他渴望能在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施展他的抱负，于是，他收拾行装来到了长沙，在这里开辟他的新天地。

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地处洞庭湖南岸，面向长江。它的面积虽

然不大，但却举足轻重，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湖南民风强悍也比较保守。鸦片战争以后，它的保守空气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欧风美丽的飘打侵袭，但总的来说它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以及由这些外来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各方面变化都远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广州。直到1899年岳阳才作为湖南第一个通商口岸对外开放，而它的邻省湖北汉口，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就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开放了。彼此相隔了30多年时间。19世纪末，湖南以守旧堡垒而闻名全国，在国人的眼中，它像西藏拉萨一样与世隔绝。有一位英国传教士曾经这样描述过湖南的保守，他说：“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令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所有外国事务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但事实上，湖南决不是死水一潭，它在不断地积聚着能量，一场石破天惊的大改革就要到来了。

从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及其湘军开始，就不断有一批批人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成为较早的觉醒者，成为创一代风气的人物，其中的佼佼者如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在《伊犁条约》的谈判中敢于“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外交家曾纪泽等人。湖南向来有着深厚的教育传统，其省城长沙有大学城的美称，这里有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志向，受到新思想洗礼的如谭嗣同、唐才常那样的青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保守的现实，渴望能通过他们设计的改革方案，使湖南使中国重振雄风。很快地，湖南后来居上，转而成为改革先锋。

1897年湖南省一些主要官僚，包括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以及督学江标等人都是一些具有改良倾向的新派人物。

巡抚陈宝箴是清朝举人出身，《马关条约》以后曾上书皇帝力倡改革。1897年担任湖南巡抚以后，立即着手小范围的改革，整顿官僚队伍。作为湖南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湖南新政办报纸、开学堂、兴实业、请人才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戊戌变法中，他保奏了一些改良派上京辅助光绪皇帝变法，并且是少数几个光绪能指挥得动的地方官。戊戌政变以后，陈宝箴被宣布革职罢官，永不录用。

按察使黄遵宪是中国早期出色的外交官，他很早就放弃了科举仕途，自愿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先后出使过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出使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日本国志》，书中详尽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情况，并对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进而阐述了他的变法思想，这部浸透了他心血的书受到了具有新思想的人的高度重视，被称为“数百年来鲜有之奇作”。黄遵宪在湖南主管司法、治安等工作，一到任上，他便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广新政。戊戌政变时，黄遵宪因病在上海留医，这使他极偶然地躲过杀身之祸，被罢官回乡。黄遵宪还是近代最有名的诗人，著有《人境庐诗草》。

此外，学政江标和后任徐仁铸都是以变风气，开辟新局面为己任的官员，他们在湖南维新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样，有了唐才常等具有初步改革实际经验的实干家，有了有利于改革的宽松环境，一场震动全国的湖南维新运动很快在全省行动起来了。

鉴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依然昏昏沉睡不知觉醒的现实，唐才常将他参与改革的重点放在开民智上。通过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唤起人们的觉醒。

1897年4月，由江标发起，湖南宣传新思想的第一份报纸《湘学（新）报》诞生了，它是1张旬报，1个月出3次。唐才常因其改革的热情及脚踏实地的办事作风被聘为报纸的编辑，《湘学报》创刊的目的，是为了讲求中西有用之学，所谓有用，就是能够“图富强”、“存遗种”，也就是对振兴中国有用。唐才常他们将“有用”之学分为6科在报纸上设专栏。这6科分别是史学、掌故、地理、算学、通商以及交涉。其中地理与算学主要是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商学、交涉（即外交）主要介绍资本主义各国社会、经济及历史状况。而史学和掌故主要通过专论的形式从中国历史中汲取民主思想的点滴精华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报纸在每一学科的专栏前，设总论1篇，然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问答、解释。在报末，还附有一些浅显的理化知识。巡抚陈宝箴下令让各州县都订阅该报，并要求各书院的学生以及商人、士大夫认真阅读，以取得有益的知识，将来可以有所建树。有一段时间，湖广总督张之洞看过报纸后也因为《湘学报》讲求经济时务十分赞赏，要求湖北各州府也都要订阅。《湘学报》的影响越出了湖南。

唐才常作为《湘学报》的主要作者为报纸写了大量文章，文章涉猎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对西方历史、现状的介绍、各国外交情况、中国内政改革的主要方面等《公法通议》、《论中日通商条约》、《兵学余谈》、其代表作有：《史学略论》、《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外交论》、《格致浅理》、《质点配成万物说》等等。这些文章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提倡实学，反对旧学。

《湘学报》为湖南维新运动起到了开风气的的作用，是改革的急先锋。谭嗣同称赞《湘学报》，“湖南风气的变化是从湘学报开始的”。这既是对报纸褒扬，也是对唐才常这一时期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投身《湘学报》事业的同时，唐才常又和熊希龄等人一起参加了时务学堂的筹备工作。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它既是湖南新政的产物，又是湖南新政的宣传重地。创办该学校的目的在于“用可用之气、开未开之民气”。也就是开民智、兴民权。学校聘请康有为的学生大名鼎鼎的梁启超负责中文教习。梁启超因在上海编《时务报》畅言变法而名声大震，被人誉为“时代骄子”，与他的老师合称为康梁。在湖南方面的再三请求下梁启超到了长沙主持时务学堂的工作。唐才常担任了中文教师。

时务学堂的功课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学、分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以及中外史志等。普通学也就是现在的基础课，是学生入学以后必读的课程。另一种功课称为专门学，也即专业课，包括有公法学、掌故学以及格算学等，文理兼顾。

唐才常和学校其它教师一样，鼓励学生阅读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科学的书籍。不仅在课堂上以中国民主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启发、鼓励学生。更加在学生作业本上加批注与学生探讨新思想。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是求知欲极强的同学少年，而学校里的教师也是一批激进的年青人。唐才常这年30岁，主管行政校务的熊希龄27岁，而学校的灵魂人物梁启超只有24岁。所谓教学相长，学生与教师相互促进，互相影响，使各学校的空气日日激进，成为新思想的策源地。

时务学堂为中国近代的改良与革命运动输送了宝贵的人才。秦力山、林圭、田邦浚等时务学堂的学生后来均成为自立军的领导骨干，与唐才常由师

生变同志。他们中一些人为改良而献身，牺牲在张之洞的屠刀下，一些人则转向了革命，成为孙中山的信徒。

正当唐才常为改良而办报纸，开学堂摇旗呐喊的时候，山东爆发了胶州湾事件。德帝国主义借口山东教案而强占了胶州湾，由此开始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继德国之后，沙俄、法国、日本以及英国等列强把中国看成是一块任人宰割的唐僧肉，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范围、东北、西南、东南以及长江流域地区纷纷落入魔掌，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

祖国的好山河岂容他人染指！唐才常再也坐不住了，他必须行动起来去解救面临着瓜分豆剖命运的祖国。如何解救？报纸、学堂固然重要，但远水灭不了近火，他需要一个更直接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准备地方自治以保全湖南，保全中国。1898年初，由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发动成立了南学会。南学会是地方自治的一次尝试。所谓地方自治并不是脱离中央政府的意思。在和平时期它负责整顿、训练人才、发展地方经济。在战时则要反抗侵略、保卫疆土，使不至于全国一起沦陷，从而保全中华民族的火种。梁启超当时也在湖南，他在谈到南学会的缘起及任务时说：“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要独立自主必须要训练民众参政能力，“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由自治之实际然后可也。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也就是说南学会的任务就是训练人民的参政能力，为自治作准备。南学会成立后，得到巡抚陈宝箴的支持。

陈宝箴负责选拔10个本地绅士为总会长，然后再由这10人各自举荐优秀人才入会，成为会友。会友共分3种，一是议事会友，主要任务是制订学会的规章条例，组织会友的活动。它由南学会的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二是讲论会友，演讲是南学会的主要活动形式，每次演讲就由这些讲论会友充任，主要有皮锡瑞、黄遵宪、谭嗣同、邹代钧等人。第三类会友是通讯会友，通过书信来往结交朋友解答疑问，借以宣传南学会的宗旨。这类会友上至绅士士大夫下至商人阶级。

学会不仅宣传西方新思想，而且它针对地方行政进行探讨，给政府提供参考方案。这是南学会训练民众参政的举措。

唐才常在南学会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他虽然没有直接发表演讲，但是他策划这些活动，参与讨论地方政经的兴革，不仅使他的组织能力大大提高了，也使他更加贴近现实，使他的文章针砭时弊，更富有现实性和战斗性。

南学会组织的讲演活动不仅能得到地方长官的支持，陈宝箴、黄遵宪都在学会演讲过，而且听众也十分踊跃，每次讲演都有1000多人参与，场面十分热烈。演讲的内容包括新学宣传方面，此外还有地方新政事务，如设保卫局、兴办矿业等，它逐渐成为地方议事中心。

南学会的成功样板推动了本省各地学会的建立，不只是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就是许多偏僻闭塞的小城也有了新气象。虽然各地学会的目的不尽相同，但都侧重于“联通群力，振兴新学，”联通群力也就是发动群众，唤起民众的意思。

唐才常在创办南学会得到各地一呼百应以后，又趁热打铁和谭嗣同一起在长沙成立了“湖南不缠足总会”，在浏阳成立了“群萌学会”。前者以反对妇女缠足为出发点，提倡移风易俗，改造陈腐的社会风气。妇女缠足看上去比不上军国大事那么重要，但它已有1000年的历史，它用一条长长的布条即可把全国的妇女禁锢在家庭中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唐才常他们深深感到能

否把妇女从封建禁褥中解放出来，也是开民智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到民族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大事。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号召男子应娶不缠足女子为妻，该学会的一个入会条件就是保证不支持家人缠足，不娶缠足女子。当时在湖南的新派人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都担任了这一学会的董事以表支持之意。而湖南各地也设有分会，响应禁止缠足运动，声势壮观。

南学会对湖南风气开放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不断努力下，湖南的面貌有了可喜的变化。就连远在天津的《国闻报》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称赞说：“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沿海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梁启超也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将湖南大加褒扬，这虽说是宣传笔法，但也言有实据。

为了记录、宣传学会以及本省的各项维新活动，唐才常又负责主编了《湘报》。当时湖南已有了《湘学报》，为什么还要办《湘报》呢？唐才常在《湘报序》中谈到在胶洲湾事件后，亡国的警钟已在耳边响起，但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不知振作，不思进取。于是集资办报，以补湘学报的不足。《湘报》以日报的形式出版，可以做到每天都新。唐才常希望通过阅读报纸使国人能得到新思想的沐浴，一人能拥有千百人的智力，可以不出家门而了解五洲大地的形势。开民智的迫切心情跃然于纸上。

《湘报》创刊后，与南学会，时务学堂联为一气，相互呼应。它不仅大量刊登本省新政情况如南学会的讲演、问答记录、时务学堂、保卫局等的规章以及活动情况等，它还对全国其它省份涌动的维新浪潮如康有为的保国会的活动情况作了适时的报道。而各国时事、商务等也是每日报纸必备的内容。《湘报》是湖南维新活动中一个最主要的舆论阵地。

作为报纸主编，唐才常除了组织被顽固派称为“言论偏激、惊世骇俗”的战斗檄文外，他自己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文章，如《时文流毒中国论》、《湖南设保卫局议》、《论中国应和英日联盟》等，涉及内政外交，对资产阶级民主民权学说大加申张，对地方自治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具体建议。

通过参加《湘学报》、《湘报》、南学会以及时务学堂的维新宣传、实践，唐才常始终活动在湖南新政的最中心地带，成为该运动的领导人，同时他的改良思想由朴素的感性认识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他的改良思想首先受到了康有为、严复思想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拘泥于康、严的理论，而是比他们更激进、大胆，和谭嗣同一起成为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

唐才常思想中最有特色，也高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就是他的民权思想。他认为君主专制并不是天生的，古代君臣上下关系本来是很融洽的。但自从秦朝以来，原先君民和谐的关系变成了极端专制，从此日月惨淡。唐才常这一思想明显具有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痕迹，是他受西学影响的一个方面。唐才常从君臣商订契约这一论点衍化开去，提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亿万人民共同的天下，天下既然是众人的天下，那么，以天下为皇帝个人所有作为思想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不合理的，是最自私的，而主张天下归众人所有的民主制度就是最公平的。在划分了“公之至”、“私之至”这二种制度后，唐才常以对“公之至”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了热情的讴歌，称赞它是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谛。他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将来都要走这条道路。他豪迈地宣称为了推动中国由专制走向民主富强，他愿意冒一切风险。他说“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

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君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也在所不辞，粉身碎骨不足惜。”唐才常的民权思想与谭嗣同的想法可说是如出一辙。谭嗣同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亦，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民既然能够共举一个人作为君，当然也有权利废除他。君只能被看成是为民办事的人，而不是人民的压迫者。谭嗣同的思想大都反映在他的力作《仁学》中，但《仁学》在当时并没有出版，它直到戊戌政变以后才得以刊行，因此当时一般人并没有机会拜读。而唐才常的思想，主要表露在他发表在《湘学报》、《湘报》的文章中，因此还是颇有影响的。他们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康、梁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范畴，成为维新运动中的左翼双峰。

虽然唐才常有为国献身的思想，受民主民权思想的影响，但他始终没有超过改良主义的樊篱，抛弃皇帝去走革命的道路。他还是把中国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渴望一个好皇帝，所以他听到光绪皇帝诏定国事，宣布维新变法时异常高兴，他充满了乐观的语气说，从世界上来看，从上而下的变法是“顺而易”的，而从下而上的发动的变法一定是“逆而难”，现在皇帝宣布从上而下实行变法，中国的维新运动就一定能成功的，这是4亿中国人的荣幸啊。他还准备筹些钱去买个官做，以帮助皇帝推行变法。当然这是后话，但它反映了唐才常对光绪的盲目、幼稚的认识。

唐才常以精明的才干与敏锐的学识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誉，他与谭嗣同合称“浏阳二杰”，二人在湖南配合默契，成为一时无两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也遭到了以王先谦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所谓“新旧斗争，湘省尤烈”。顽固派打着所谓“翼教”、“护圣”的旗帜向维新志士宣战。

顽固派指责时务学堂培养无父无君的乱党，南学会主张平等是纲常堕落的禽兽行为，对于唐才常们宣传的君民契约观点，他们称之为大逆不道，并以三纲五常为基础为封建专制辩护，称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却不能用夷变夏，不能用资产阶级的学说来改造中国。为此唐才常辩护说，民权理论并非西方的发明，孟子早在2000年前就说过君轻民贵，这就是中国的民权思想。唐才常这种“古已有之”式的论证，在当时能够起到使民众容易接受的效果。

顽固派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下至劣绅，上至朝廷守旧官僚上下夹击，排挤维新人士。梁启超被迫离开湖南远上北京，许多顽固分子的“眼中钉”如樊锥，皮锡瑞父子等被暴力驱逐出境，更多的人怀着黯淡的心情远走他乡了。轰动一时的湖南维新运动因顽固派的阻挠走向低潮。

唐才常所参与创办的各项新政事业也物是人非，被迫改法更张。时务学堂这时改为求实书院，激进的教师被辞退，学生被驱逐。《湘学报》成为张之洞的御用报纸，收敛了早期的战斗锋芒，转而刊起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与维新运动唱起了反调。南学会被顽固分子诬蔑为“私立党会”，演讲活动只持续了半年也被迫偃旗息鼓。而《湘报》从创刊伊始就受到了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加上张之洞的干涉，使得唐才常的那些“偏激”、“激烈”的文章与《湘报》被迫绝缘。唐才常失去了他一手创办的事业。回想一年前，他怀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从浏阳来到长沙，办学办报，干得轰轰烈烈，取得了初步成效，湖南从守旧堡垒变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省份。但转眼间他苦心经营的心血成果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他感到痛苦彷徨，并在彷徨中期待着希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改革的时代召唤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正当湖南的改革遭遇挫折陷入绝境的时候，在全国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帷幕，这就是发生在1898年夏的“戊戌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全国进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皇帝变法，这就是“公车上书”。随后康梁又创“保国会”，办《时务报》，大造维新变法的声势，他们的主张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康、梁成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数次上书，呼吁变法，这逐渐打动了光绪皇帝的心。

光绪皇帝一方面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感到了变法对于保持清政府统治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光绪也想通过变法行动将实际的统治权从慈禧太后手中夺过来。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光绪皇帝最后下定了变法的决心。1898年6月，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宣布变法，成为戊戌维新的开始。唐才常将这次变法比作为中国的明治维新。

维新运动开始后，康有为等一批维新派人士得到了重用。康有为担任了“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官虽不大，但拥有随时可以上奏皇帝的特权，他成为光绪这时最倚重的人物。变法伊始，谭嗣同以“天才卓犖（luò）、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的才干受到光绪的重用，并要他立即进京，这使因为湖南维新受挫而苦闷的谭嗣同精神大振立即抱病北上。临行前，唐才常前往送行，二人依依惜别，并相约“生同志，死同烈”，这表明他们从湖南的现实看到了变法的严酷性，并做好了为变法而献身的思想准备。这是一次真正的生离死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谭嗣同带着舍身成仁的壮烈情怀北上了。

1898年9月初，光绪皇帝终于召见了谭嗣同，在谈到维新人才时，谭嗣同尽力推荐了唐才常，称他“沈毅有识，于中外学问经济靡不贯彻”，是皇帝可以信任的人才。光绪大喜，让谭嗣同担任军机处官员，负责审阅奏章，草拟谕旨等，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又要唐才常进京。这时已经是帝、后二党冲突激化的时候。慈禧太后、荣禄等后党顽固分子已经不能容忍光绪及维新派所做的一切，废黜皇帝推翻新政的密谋正在慈禧太后那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维新派自感势单力薄无所依靠，谭嗣同是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举荐唐才常，他希望能和这个最亲密的、最信赖的朋友携手合作，共渡难关。谭嗣同见过光绪后立即电召唐才常进京，热切地盼望着老朋友的到来。

远在湖南的唐才常接到谭嗣同的召唤后，立即出洞庭北上，但当他刚刚赶到汉口时，慈禧太后已经发动了政变，幽禁了光绪皇帝，追捕维新领袖。康梁在日本大使的帮助下逃亡日本，而谭嗣同等人光荣就义，成为“戊戌六君子”。

噩耗传来，真如晴天霹雳，唐才常虽然已有为变法而死的心理准备，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二十年的刎颈之交，居然这么快就离他而去！想起他和谭嗣同在岳麓书院相识时，大家还是两个弱冠少年，凭着一腔热血在一起指点江山，抒发救国救民的情怀。共同的理想，相似的性格使他们结成好友。他们的深厚友谊经过湖南新政中暴风骤雨的考验愈加牢固和纯净。这次北上，原想能和谭嗣同在北京再展鸿图，实现理想。谁曾想忽然之间二人已在不同世界，阴阳两隔。虽然谭嗣同在就义时慷慨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但他确是带着遗恨去的，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开始变法，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变得富强起来，他都会死不瞑目，不安于九泉之下的。唐才常决心要为变革中国而继续奋斗下去，实现战友的遗志。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后，真正的倒行逆施，将新政措施全部废除，一切恢复旧法。维新变法的活跃人物或者牺牲，或者远走他乡，或者被囚禁、革职。京城之大，中国之大，已经没有维新派的容身之地了。而顽固势力重新抬头，异常活跃，唐才常形容政变以后湖南形势是“谣言四起，同人星散，平日矢志之小人，因利乘便，睚眦（yá zì）报复，无所不至”。“不逞之徒，造谣生事，横无人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政变之后极其黑暗的形势，唐才常发出了这样的誓言：“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nìng）臣头。”带着这样的决心，他奔波于上海，日本各地。总结湖南与全国变法的得失教训，他已经初步意识到，变法光靠“文”还不行，必须要有武力作后盾，必须要有新的力量，带着这个想法，他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

二、自立军起义

戊戌政变后，面对顽固派在朝廷，地方的倒行逆施，唐才常已无法在乡间立足，他的活动舞台从中国的内陆腹地转向了海外以及上海，这个中国最西化的城市。

在对香港、新加坡、日本作了短暂访问之后，1899年2月唐才常回到了上海，主持了《亚东时报》的编辑工作。《亚东时报》于1898年在上海创刊，它由日本人主办，由日本人山根虎之助编辑。唐才常与山根虎之助是老朋友，加上唐才常在湖南办《湘学报》、《湘报》成绩有目共睹，于是等唐才常到上海以后，决定由唐才常接办该报。唐才常接办《亚东时报》以后，将《亚东时报》变成了改良思想的宣传阵地。为了鼓舞斗志，他上任伊始就将谭嗣同的生前未能出版的遗作《仁学》，在《亚东时报》上分期连载。完成了谭嗣同生前的遗愿。虽然《仁学》作于1897年戊戌变法前，但其反对封建专制，号召冲决君主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一切之网罗的战斗精神，在戊戌政变之后的黑暗日子里仍是振聋发聩尤能给人以勇气。唐才常借《仁学》的发表以缅怀先烈鼓励来者。

面对政变以后顽固派的疯狂报复，唐才常没有气馁，而是从反面看到这正是考验人心的最佳时刻。他在《亚东时报》上发表《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一文中谈到政变以来，“上下人心，轩豁呈露”，这是“将来用人行政之一大权衡也”。所谓大浪淘沙，一些附庸新思想的人放弃理想，呈现出他的本来面目，这正是一个纯洁队伍锤炼斗志的最佳时机。

唐才常在游历香港、南洋时，亲眼看到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与当地的华侨资本家广泛交友，看到这些国家的商人和资本家都能够知道变法求新所带来的好处，这使他深受鼓舞与启发。回到上海以后他发表了《砵旧危言》，主张中国内地的商民应该效仿南洋，开商会，办学堂。有了商会这样的团体，才能够抵抗封建政府剥削的毒螫（shì），才能够在生产技术方面有所突破，独立创造，以与西方各国进行商战，保护中国的应得利益。他理想中的商会“以议会之规模，行商会的权力”这必须是一个政治团体，他对商会规定了两大任务；对外进行商战抵御外洋；对内开民智，参国权控制政府。唐才常设商会的思想和他在湖南时创立南学会的思想一脉相承，二者都是通过组织团体的形式，以达到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实质，从而在封建政府中夺取一些应得的权力。南学会的希望是寄托在绅士士大夫身上，戊戌维新也是

将希望寄托在士大夫身上，结果证明中国的士大夫无力承担起此重任；唐才常现在的目光转向了商人资产阶级，希望能为改革思想找寻新的主力军。唐才常的这种思想是他在走出了湖南这块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相对闭塞的土地来到南洋和日本后开了眼界的结果。他的思想代表了一部分刚刚兴起的中国商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相对于腐朽衰弱的封建地主阶级来说，也是一股需要扶植的新生力量，一股新鲜活泼的空气，这也是唐才常在戊戌政变后思想发展的一个方面。

唐才常思想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对清王朝的认识。戊戌时期，他宣传氏权思想，大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专制，但骂来骂去每次到他生活的清王朝便戛然而止，不再下文，这表明他对清王朝还是抱有极大希望的，并没有反满的思想。但在戊戌政变以后，唐才常对这种思想渐生怀疑，朦胧地萌发了反抗民族统治的情绪，他在一首诗中将清王朝斥之为“胡人”指责他们窃取政权，使这 250 年以来，中国一直生活在黑暗贫穷之中。“胡人”是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在中国历史上是指的北方游牧民族，清朝的满族人是由东北入主中原的，所以唐才常也将他称之为“胡人”。现在看来鄙视少数民族当然是不对的，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个称呼是对清王朝的反对态度，是有积极意义的。

唐才常这段时期思想较之在戊戌时期更为激进，有许多地方超出了康、梁的改良主义范畴，而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了一些共同语言。这也为他们今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1899 年夏，唐才常离开《亚东时报》，再次东渡日本，与康，梁会晤，讨论形势与改良派的活动方针。这次东渡唐才常取得了实质性的收获。

这年秋天，唐遇见了毕永年，毕是唐在长沙岳麓书院时的好友，曾积极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曾北上见到了谭嗣同，当他看到谭嗣同他们在帝后两党斗争中一筹莫展，只能依靠袁世凯以后，觉得变法维新已无前途，于是东渡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抛弃了改良幻想成为革命派一员。经过毕永年的介绍，唐才常在日本横滨会见了孙中山先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会谈。

当时孙中山正在酝酿在广东的惠州举行起义，武装反抗清王朝。唐才常也正在寻找新的方向推进改良运动。会谈中，二人讨论了革命改良两派合作以及广东两湖地区起兵计划。这次会面给唐才常一个很大的鼓舞，激发了他“树大节，行大难，行大改革”的政治雄心，两湖地区的起义计划也开始酝酿。

当然，这并不表示唐才常已抛弃了改良主义主张而皈依革命真理，在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这一根本问题上，唐才常的认识与革命派的主张还有很大的距离，唐才常虽然极其憎恶西太后，发誓要用鲜血来为战友报仇，但始终对政变后被幽禁的光绪帝抱有幻想。天真地以为中国有了这个好皇帝就会有希望，他跳不出康有为保皇思想的圈子，因此他只提“勤王”。不提反满。而革命党人的口号毫不含糊“排满革命”，认为光绪也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两种想法可谓是南辕北辙，但唐才常身在东京不能不受到青年留学生激昂的革命思想的感染，不能不受到革命空气的滋润，这使得他左右彷徨，既要保皇，又要革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带着这重重矛盾他于 1899 年冬回到了上海，开始武装勤王的准备工作。所谓勤王就是保护皇帝的意思，武装勤王就组织义兵用武力保护皇帝。

唐才常回到上海以后，立即着手组织“正气会”，作为将来武装起义的策动机关。这些都在一个借日本人名义发起的“东文学会”掩护下进行的。“正气会”的名称来源于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但唐才常的正气会还没有文天祥那样的意志坚定，而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混合物。在宣布正气会成立的序文中，一方面攻击清政府“甘首腥膻，自甘为隶”，指现清政府对洋人的屈膝投降，成为洋人的奴隶，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革命派提倡排满的根据，清王朝的统治者满人跟汉人是不是一条心的，这两句是民族革命的口号。另一方面又宣扬要“忠君爱国”称“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承认与满清有君臣关系。前面提倡反满革命，笔锋一转又唱君臣赞歌，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并列在一起，这反映唐才常这时思想上的矛盾之处，反映了正气会与两大政治组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局面呢？这要从当时情况谈起：

中国近代史上宣传改良与主张革命的两派差不多都是在甲午战争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时由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开学堂，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康、梁的主张虽然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击，但在一些有识之士中间很快得到共鸣而风靡全国，渐成气候，并且最终促成了虽然只有 103 天但影响深远的戊戌维新。康梁的主张是在不动封建政权的条件下实行改革以挽救中国。它符合历史的潮流因而是进步的。几乎在同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开始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首次尝试，但革命党人这时的影响仅局限于海外及华南地区，他们要推翻皇帝的行动当时还不能被世人所理解，在世人的眼中，革命党人只是一些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改良派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代表时代的主流部分，革命派处于积蓄力量的时期。

这种两派并存以改良为主的局面在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才逐渐发生了变化。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亡命日本，他的活动舞台也被迫移师海外，虽然康梁在学生华侨中仍享有很大的号召力，但改良派正在失去它自身的活力，康有为从政变前依靠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初衷出发，到政变后因眷恋光绪皇帝而变成保皇，他死抱着保皇的教条不放，认为中国要保国保种就非变法不可，要变法就非光绪不能，他将忠君与救国相联，将光绪与变法并列，完全颠倒了逻辑。为了光绪皇帝的复辟，康有为甚至把希望放在英、日两国政府能干涉中国内政，帮助皇帝重掌政权。1899 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宣告了康有为由追求变法图强的维新派沦为专事帮助皇帝复辟的保皇派，他关注的重点从国家的命运变为皇帝一个人的命运。他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始终停留在原地，也就被时代抛弃了，被追随时代的人抛弃了，当康有为蜕变为保皇党的时候，改良派阵营中有人不满意康氏逻辑，或者转而加入革命阵营，如章太炎、秦力山等人，或者左右徘徊不能定夺，最后付出了血的代价，如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起义那样。

虽然革命派排满革命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连改良派主将梁启超因为身处东京激进的留日学生中间也受的影响，激扬慷慨地为民主共和大唱赞歌，声称中国“舍革命而无别法”，只有革命一条路，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与康有为的保皇思想有了很大的分歧，致于康有为认为梁启超落入了孙中山的圈套，不得不对他运用师道尊严把他调到檀香山去组织保皇会，从而远离东京的激进气氛。

即使如此，这时革命派无论在人数方面还是在舆论宣传方面与保皇派相比都处于劣势。故此，他们希望通过两派合作来成大事，康梁在戊戌政变后刚到东京，孙中山就通过日本人宫崎寅藏与之联系，表达了两派合作的愿望，虽然此次遭到康有为冷淡的拒绝，但孙中山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在以后孙中山与唐才常会谈时，也曾表示假如康有为能够接受革命真理，废弃保皇的成见，不仅两党之间可以合作，而且还能使革命党人捐弃前嫌与康有为握手言欢。

因此，保皇和革命二派虽然奋斗的目的不同，一个要拯救皇帝，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但在1900年前后，却处在一个松散的合作同盟中，唐才常的自立会、自立军就是这个合作的产物，虽然在其中两派各唱各的调，但都想通过自立军实现自身目标。

唐才常本人的思想则摇摆于两派之间，他既想利用康有为保皇会筹来的钱做活动经费去完成他的目标，即用武装的办法来达到变法的目的，为此他打“勤王”的旗号，但他的部下有许多是兴中会会员，他们帮助他发动了两湖地区的会党力量，唐才常要起事必须倚重他们的力量，因此多少在思想上受他们的影响。两种力量同时在唐才常身上施加影响，所以导致了既“勤王”又“排满”的不伦不类不明不白的目标出笼。

唐才常成立正气会以后，便积极准备在长江流域起兵勤王，而孙中山也正在布置广州、惠州的起义。为了能南北呼应使两地同时起义，孙中山指示正气会中的部下不要局限于地域、党派的不同，尽量配合唐才常成事。

就在正气会为武装勤王而紧张筹备的关键时刻，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中国北方的经济在甲午战争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造成了北方农村经济的凋蔽。一些农民、小手工业者被迫离开了赖以维生的土地、手艺，流离失所。另外在文化方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势力扩大，它们在农村插手地方事务，为非作歹，使得当地农民与教会矛盾激化，多次发生所谓教案，每次民教纠纷发生后，地方官僚因惧怕洋人势力极力偏袒教会，这使得乡民与教会积怨更深，忍无可忍，便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可走。加上当年北方大水灾，民不聊生，天怒人怨，走投无路的农民最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他们把目标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尤其是教会势力，提出了“反清灭洋”的口号，他们的势力迅速从山东，天津蔓延到整个华北地区，以慈禧为首的朝廷当权派为了达到巩固自身的政权，铲除异己的目的，罪恶地利用了义和团，将“反清灭洋”的口号改头换面，变成“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斗争如燎原烈火在北方大地上燃烧起来，它引得帝国主义列强极度不安。1900年6月英、法、德、日、意、奥、俄、美等八国组成了联合部队，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八国联军之战”。侵略军首先从天津港口登陆，经过激战终于占领了天津，并沿运河方向进犯北京。慈禧太后见势不妙立即挟同光绪皇帝狼狈而逃，一口气直逃到山西太原才惊魂稍定。在西逃的路上，慈禧太后发表文告宣布和联军一起剿灭义和团并命两广总督李鸿章担任了中国方面议和的全权代表，而议和的一个总原则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就是说只要洋人能够高兴，大清朝可以要什么给什么，这真是一个最最明白的卖国宣言了。朝廷这时的心态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是争做奴隶，只恐怕想做奴隶而洋人不给机会罢。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看法，无论是革命派或者保皇派都很不以为然，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次运动的反帝爱国性，反而认为义和团所采用的独特的宗教形式是“妖言惑众”，指责他们“煽乱危邦”，是导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罪魁祸首。他们没有认识到义和团所长正是两派的所短，义和团有着浓厚的群众基础，但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以致被清政府利用，而革命、保皇两派都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的，但缺乏群众基础，势单力孤。两者在这大好机会却失之交臂，相互误会。这固然使后人扼腕叹息，但它决不是由某个人负责的，这是历史的局限。尽管革命、保皇两派不赞同义和团的所作所为，但对于由这个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混乱倒都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可乘之机，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两派立即着手采取行动。孙中山派史坚如、郑士良分别前往广州、惠州活动，作惠州起义的最后准备，保皇派更是活动频繁。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在广东开国会，动员南方各省独立成立新政府，然后再以政府的名义北上救驾，这样自立军勤王就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了。

根据康有为的指示，唐才常宣布将不久前成立的“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宣布成立“自立军”，这里的自立二字，就是自行独立与慈禧太后的北京进行分庭抗礼。他们将南方的独立及新政府的建立的希望放在了几个朝廷大官身上，尤其是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江总督刘坤一身上，指望他们能与保皇派合作，抛弃慈禧改投光绪。尤其是三大臣宣布“东南互保”，不承认朝廷对联军的宣战而继续与洋人合作以后，鼓动他们独立的希望似乎更大了。

为了能使自立军尽快地师出有名地北上勤王，1900年7月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名，邀请在上海的社会各界名流共80多人在英租界的张园开会，这次会议名称冠以“中国议会”，或称“国会”。会议选举了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美籍华人容闳为会长，老牌维新宣传家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则担任了总干事，负责制订会议章程等具体事务，他是会议的实际操纵者，到会的这80多人大都是冲着“保国保种”的招牌乘兴而来的，他们并不知道自立军的秘密以及保皇会的打算，所以会议的目的并不明确。唐才常宣布了这次会议所要达到的三个目标，这些目标与唐才常组织的正气会、自立会一样自相矛盾。这三个目标是：第一，保全中国自主独立之权；第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否认清政府就不该保存大清帝国与光绪皇帝，要保存帝国与皇帝又何来自立新国呢？这个自相矛盾的宣言刚一出笼，就引起了参加会议的名士章太炎的大为不满，他对唐才常的勤王主张大为不满，认为当时形势再讲忠君爱国已不合时宜，苦口婆心劝唐才常放弃康有为的保皇主张，不要被康有为利用。其实，唐才常勤王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帮助光绪重掌政权，他也不是康有为那样津津乐道圣上如何英明的死心塌地的保皇派。他和康有为的关系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康有为认为虽然他和唐才常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唐才常能够号令一大批从湖南出来的参加过湖南维新运动的学生，如果失去了唐才常以及湖南学生，保皇势力便是势单力薄难成气候，所以康有为认为“勤王之业，舍唐莫属”。而唐才常也想利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他的武装变法提供物质支持。他依赖康有为的经费粮饷，所以必须打出忠君爱国的旗号。而唐才常这点想法又不宣讲给别人听，只好听凭章太炎误解，一味敷衍，二人各唱各调。最后气极了的章太炎在会上就当众剪掉了自己那条代表满清子民的辫子，脱下长袍换成西装，宣布退会，并与唐才常绝交。章太炎后来东渡日本加入了革命派阵营。但有意思的

是章太炎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写了一篇文章，为唐才常昭雪，称他庚子自立军起义，是“托名勤王而志在革命”。对唐才常的思想行为表示了谅解。另一个不满意唐才常这种骑墙态度还有唐才常的老朋友华永年，他指出唐才常的宗旨不明，名义不顺，难以服人，二人整整辩论了一天，唐才常仍然不改初衷，华永年不得要领，只能不欢而散。

不管反对的人如何，国会算是开过了，勤王的政治准备工作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准备起义进行最后一击了。唐才常开过国会后，匆匆赶赴汉口，他准备将武汉作为起义的中心地区，因此在汉口的英国租界内成立了自立军的指挥机关。

我们在谈自立军起义的时候，也许读者朋友会问，自立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装呢？唐才常究竟依靠什么人去完成他行大改革的理想呢？

自立军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各地的会党、各省的防军，这是唐才常所有借助的主要力量；另一部分是唐才常的旧同事、学生等。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再举大旗，使这些当年在湖南一起携手战斗过的战友又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自立军的旗下，他们是这支队伍的骨干领导力量。

唐才常所起用的会党多数是长江流域的哥老会成员。会党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绿林好汉”，在清朝乾隆盛世时就有了秘密会党组织，他们活跃在社会底层，劫富济贫行侠仗义而又行踪不定，故被称为“绿林”。到了近代，清政府依靠湘、淮二军镇压太平天国后，不想让曾国藩、李鸿章拥兵自重对朝廷形成威胁，大量遣散这两支军队。这些已经离开了土地的士兵们被遣散后生活失去了保障，成为失业人口，为了能生存下去只能组织团体相互接济，团体成员之间相互平等，这些团体渐渐有了会党的雏形，发展成游离于主体社会的秘密社会——会党。会党拥有严密的组织，也有相对稳定的活动范围，在长江流域这些会党被称为哥老会，而在两广地区，会党的名称成了三合会。哥老会或者三合会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它们里面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地方帮派，帮派之间以名称不同的山堂相区别。一个山堂就是一派，其首领被尊为“龙头”。这些龙头大哥就是会党中最受人尊敬、最有权威的人。会党拒绝接受清政府的统治权威，是反清组织。参加会党的人都是一些社会底层从事被人看不起的工作如挑夫、矿工等，看起来他们和唐才常这样的知识分子似乎隔着一道很深的社会鸿沟，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呢？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民之路时，很早就把眼光投向这一部分人身上，看了这些江湖豪侠身上有着知识分子没有的力量，开始突破以士农工商划分社会等级的旧观念，向下层寻求新鲜血液。唐才常本人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就萌发了这种想法，为此特地叮嘱在乡间的兄弟“如有江湖游侠豪杰之人，当隐识之”。结交这些绿林英雄的想法反映了唐才常开始对他所信奉的民本思想作更多的探索。唐才常在信中将他这个想法说得很清楚：“又处乡间，宜多与各田户、乡民来往，而结其心。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盖兵乱将起，先能得若辈之心，则仓卒中或犹有为之援者，可以保性命身家于乱也。”他要兄弟们多与下层人民来往，不要高高在上，以为自己是读书人而自命不凡，因为今后乱世到来时还得靠这些人才能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个人是这样，国家要保全种族、文化又何尝不需要这些人呢？唐才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倒是得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

无独有偶，唐才常的想法到了谭嗣同那里变成了身体力行的行动。当谭嗣同在北方游历时，他曾拜北方著名的豪侠“大刀王五”为师练就了一身过

人武功，为世人称奇。

革命领袖孙中山在这一点上也是最早的实践者，在他发动的早期反清政府起义中，会党一直是主力军。为了加强会党与兴中会的联系孙中山还在1899所成立了主要由南方会党各派成员参加的组织“兴汉会”，孙中山被选为该会的总理，被会党成员遥拜为极峰。

总之，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与绿林好汉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上演了幕幕悲喜剧。

从1899年冬唐才常和孙中山约定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同时起兵，到1900年夏唐才常在上海开国会完成政治准备。这段时间除唐才常在上海统筹各项事务外，他的部下早已在两湖及其它地区进行秘密的发动工作了。为了便于行动，唐才常将自立军分为7个军，分别是前、后、左、右、中军以及总会军、先锋军，它们分别布置在长江流域沿岸各地及军事重镇。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各地同时进行。前军驻扎在安徽大通，由吴禄贞、秦力山领导。秦力山认识驻扎在当地的清军军官，利用这层关系，他从清军那里得到了一批武器，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他的活动也渗透到当地水师中，秦力山鼓动他们在起义时一起发难，参加自立军。经过他细致的工作，这里的人对自立军起义的目的有了较多的了解，老百姓们对自立军十分支持。起义前夕，大通城内各商点的短衫短裤已被人们抢购一空，作为起义时统一的着装。在准备起义时，秦力山看到义和团在北方发展得很快，就想与他们合作，使得大江两岸能彼此呼应。带着这个想法他一个人北上天津，求见义和团大师兄，晓以利害，动以情理，希望能与之合作，劝他们将“扶清灭洋”改为“勤王排满”，无奈义和团对光绪皇帝或者留洋学生都无好感，称他们是“二毛子”，将他们看成是洋人的一路货色。双方没什么好谈的，秦力山被义和团人轰出门去，空手回到了安徽。因此自立军的活动只局限于长江以南，它的成员也局限于会党，这是件十分遗憾的事。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农民的隔膜有多深！他们之间完全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理解。

驻扎在汉口的中军由林圭领导。林圭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政变以后赴日留学，与唐才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于1899年底为准备自立军起义回国。为了安全起见，他在汉口用了一个日本化名开展工作，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会党，他力图在会党中招募自立军成员。为此他在两湖地区的各个重要口岸如汉口、襄阳、沙市、荆州以及岳阳、长沙等地开了许多旅馆、客栈，将它们作为自立军新成员的集中地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惨淡经营，他在汉口的准备工作已颇有生气，甚至连舆论工作都已做好，汉口的街头巷尾都在传说即将有一位总司令要统领大军打到北京去，从卖国贼手中救出皇帝。汉口的形势也是万事具备，蓄势待发了。

其它地区各领导人也在抓紧时间招兵买马。后军所在的安徽安庆、左、右军所在的湖南常德及湖北新堤都在发动会员，不同程度地做好了起义的准备作。

唐才常为了解决活动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仿照会党的一贯办法发行了名为“富有票”的一种票据，它以很低的价格出售，该票据既可以作为受骚扰时的一个安全保证，起保镖的作用，也可以作为一种对这次起义投资，如果这次起义成功，则该票的持有人就可兑现一定数目的现金。总之，它表明该票据的主人与这次起义存在这种连带关系，一荣俱荣，一损皆损。因为自立军发行了富有票，所以清政府又将这次起义称为“票匪”。

唐才常决定在起义计划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已准备停当，决定于8月9日这天5个地方同时举义，但是百密一疏，唐才常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大半年的心血正要毁于康有为的手上。

唐才常立志武装勤王固然与他自身的思想局限有关，但也是出于对康有为的幻想，希望能在财政、军火方面得到他的帮助。他和康有为是有互相利用的性质，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借着武装勤王的名义在海外到处募捐，得到了海外各地华人的热烈响应并踊跃出资捐款，所获甚丰。但康有为得到这一大笔钱以后却没有像事先所约好的那样接济唐才常的自立军，而是把这60万元经费私吞了事。唐才常在国内对此事一无所知频频电催康有为汇款，并且把自立军的准备工作也向康有为作了汇报，希望康有为能以大局为重兑现诺言。无奈康有为在海外对唐的告急电报置之不理，拖延了事。唐才常在汉口只能将起义的时间一再推迟，希望事态有所好转。而一些会党领袖已经不耐烦等待了。他们不听唐才常的号令，各行其事，有些已开始独立行动。自立军起义的风声已经败露，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及军队已经开始有所防备。自立军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这时远在安徽大通的前军并不了解汉口的情况。因为这5路军队相隔很远，联络起来很困难，加上清政府为预防起见已封锁了长江，所以秦力山并不知道起义时间已经变更，再加上大通城内形势也很紧急，已有一些会党成员被捕。事不宜迟，秦力山决定按原定时间准时起义，8月9日他带领主力七、八百人杀出，首先占领了城内军事要地厘金局和盐务局，并且在已反的水师帮助下夺取了8艘船只，在暂时控制局势后，秦力山又派出支队向芜湖、南陵地区进发，寻求支援。清两江总督刘坤一及安徽巡抚王之春见势不妙，急忙调集沿江的水师陆军前来支援，对大通的自立军形成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秦力山带领部下孤身奋战了3天，最后寡不敌众而被清军击溃，秦力山幸免于难，被迫再次远扬日本，从此投入孙中山的麾下，成为坚定的革命信徒。

大通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汉口，唐才常不再迟疑，当即决定于8月23日剩下的几路大军同时行动。这时自立军仍有2万多名成员，还是一支非常壮观的武装力量。8月20日，大批会党成员直到汉口，准备起义，汉口的形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地步。

但是在武昌的张之洞已经知道了自立军起义的秘密，为了预防起见，他特意加强了江河的巡逻。清政府官员之间的信息传递要比自立军快得多。大通起义的消息也传到了武昌，张之洞将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湖南巡抚，提醒他注意防范。8月21日，就在自立军起义的前2日，张之洞抢先下手，照会汉口的英国领事，要求租界当局准许清兵入内逮捕唐才常等人，8月23日清晨，租界巡捕与清兵一起包围了自立军的指挥机关。当时唐才常正在住所，听到这个消息后完全有可能尽早逃走，但他认为既然自立军已不能成事，他逃走了也没有意义，于是决定坐以待捕，并对周围竭力劝他逃走的人说“予早已誓为国死”，不必再劝。他神色自若，毫无惧意，当清兵赶到他的住处时，他早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跟着清兵出门而去。

同时被捕的还有在汉口的自立军领导人包括林圭、傅慈祥、田邦浚等共20多人，其中还有一个叫甲斐靖的日本人。同时自立军为准备起义所用的号衣、旗帜、火药、名册等机密也全部落入了清军手中。

唐才常等20多名自立军志士被捕以后，一起大叫“速杀”！“速杀”！

神情之中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慑于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张之洞不敢在白天行刑，直到当天二更以后才把他们押到僻静的地方行刑。唐才常在就义前痛骂慈禧误国、声明自立军勤王起义是为了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现在事业既然不成，也就是一死而已。他和战友们一起伸直脖颈催促清兵动手，令清兵们心惊胆战，也许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能如此从容、潇洒面对死亡的人。烈士的头颅落地了，令日月为之暗淡，天地为之哭泣。

但唐才常是充满着豪迈、乐观的精神踏上死亡之路的，也许他已急着到另一个世界去和他的老朋友聚首了。唐才常在狱中写下了两首绝命诗：“新亭鬼哭月黄昏，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秋风太肃杀，风吹枷锁满城香。”“徒劳口舌难为我，剩得头颅付与谁，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束总为斯。”唐才常确实不愧是谭嗣同最亲密的战友，二人为了中国的变法大业前赴后继，虽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们以 33 岁的生命为代价宣布中国从此将要进入一个新时代。

自立军在汉口的主力虽然来不及发难，但其它地区的自立军起义行动并未偃旗息鼓，沈荃率领的右军在湖北发动了起义，蒲圻、沙市、临湘、麻城、嘉鱼、临利等地的会党纷纷响应，冲击当地的民团、税务机关等，也颇有声势。无奈自立军领导机关已失，群龙无首，加上会党缺乏正规训练，行动如乌合之众，起义很快被清军击溃。至此，自立军起义才正式宣告失败。

自立军起义虽然没有能实现武力勤王，达到促使光绪皇帝复位的目的，但是它对清政府造成的震动是巨大的，它波及了南方的广大地区，动员了各阶层的力量。这次起义是在清政府的心腹地带的地方的一次地震，这里的一举一动可以通过长江幅射到东南沿海、西南边陲，因此清政府在自立军失败后仍是心有余悸。为了免除心腹之患而大开杀戒，大肆镇压具有新思想的人士，两湖地区受害最深，各有 2000 多人被清政府杀害。唐才常的弟弟唐才中在家乡发动会党，自立军失败以后在浏阳被捕，押到长沙，没有经过任何的审讯就被杀害了。地方上的顽固势力乘机借题发挥，以铲除新派人物而后快，成为清政府的帮凶。湖南顽固派的领袖王光谦还提示门徒叶德辉将他们杀害新派人物的情况编成一书《觉迷要条》，以示惩戒。从湖南到全国又笼罩在了黑夜之中；但它是黎明前的黑暗，虽然可怕，但黎明总是要到来的。

自立军运动可以说是失败了，它是一次流产的起义，而没来得及有所作为便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唐才常等人不仅半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自立军的失败除了康有为背信弃义这个最直接的因素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影响使得自立军终不能成事。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自立军所发生的影响。1900 年的形势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似乎都存在，唐才常将他的希望放在他的老师张之洞身上，想鼓动他在湖南地区自行独立，组成与慈禧太后分庭抗礼的政府，然后唐才常借这个政府的名义去救皇帝，这样就可师出有名。唐才常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张之洞在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宣战以后，一直心存观望，他和在南京的刘坤一以及在广州的李鸿章一起搞了个“东南互保”的声明。所谓“东南互保”就是不承认清政府的宣战声明，并在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继续和各帝国主义合作，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这个声明和朝廷的意志显然是相违背的，它摆出了一付与清政府脱离的姿态，这使得唐才常以为有机可乘，请日本人向张之洞游说，希望他早日行动。同样的想法也在孙中山的革命派当中流行，孙中山在唐才常游说张之洞的同时也请出了英籍华

人何启去游说两广总督李鸿章希望他在两广拥兵独立。李鸿章在当时也未置可否，显然与张之洞一样仍在观望时局。他们设想一旦慈禧太后在这次西逃中丧命或丢权，则他们将拥兵独立，建立地方割据势力，如果慈禧仍掌大权，他们也就继续忠于朝廷。他们的态度决定于慈禧的性命安危。在这个问题尚未明朗之前，他们也就不便表态，所以尽管唐才常早在汉口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设立了自立军的指挥机关，但张之洞隐忍不发，容忍了他们的活动。直到8月，朝廷发出了向帝国主义求和的总原则，即不管化多大的代价也要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这表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性的矛盾获得缓解，又重归于好了。朝廷重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张之洞看出独立无望于是转而镇压了自立军起义，以表示对朝廷的忠心。而唐才常并不知道其中的曲折，他只看到张之洞有独立的可能，只相信他所信赖的日本人一定能说服张之洞，结果抱憾而死。

顺便指出的是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南方各总督的独立意向也不是他们自己的主意，而是英帝国主义的意思。英国最早进入中国，在中国的利益也最大，而且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以慈禧为首的朝廷主要奉行的是亲俄政策，这使英国的势力受到压抑，于是英国利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机会，鼓动南方独立，在南方建立亲英的割据势力以确保它的在华利益，因此所谓“东南互保”只是英国利益的反映。但是清政府宣布求和总纲以后，英国感到已没有另立独立政府的必要，转而又指使南方他的走狗们改变态度。所以说自立军的失败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直接结果。

另外，自立军失败还有一条可以总结的，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发动群众？唐才常想借武力来促成中国的改革，完成谭嗣同的遗愿”但他自己赤手空拳，只能借助现成的社会力量，他找到了会党。虽然会党具有反清的性质，但唐才常和会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上的，会党对唐才常的理想并无多大的认同，对勤王的口号也没有待别的热情，但是他们看到唐才常提供给他们的经费要比孙中山给的多，给的慷慨时，便纷纷倒向唐才常的一边，毕永年这个会党与唐才常之间的介绍人看到会党这些人竟然毫无原则，便心灰意冷，决定遁入空门当和尚去了。

推动唐才常和会党合作的是物质利益的驱使和引诱。唐才常他们所提出的奋斗目标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些下层群众。也就是说即使自立军成功了，下层百姓也没有什么长远的利益，这使会党群众缺乏斗争的动力。但是光靠物质利益的推动这种联系往往是脆弱的，在起义前夕会党各派因为所得的好处不一而内讧起来，竟然各自为政，不听唐才常的号令，泄露了起义的风声，使自立军失去了行动上的先机，使清兵能从容应付。知识分子与下层群众如何结合起来，这始终是后来者难以解决又不断探索的问题。

自立军最终目的是勤王，即迎光绪皇帝复辟，而同时孙中山的革命派已经提出了“反满革命”，也就是要推翻清王朝，这二者之间的分别是巨大的，唐才常的自立军是否有它的进步性呢？自立军与革命派的关系是否是背道而驰呢，这是我们认识自立军起义所必须要了解的。

我们说自立军起义尽管发生在革命已经风起云涌的时代，但它仍有进步意义。

首先，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的矛头对准的是清政府顽固派及它的主子帝国主义。唐才常对慈禧太后深恶痛绝，这不仅是因为她发动政变扼杀了维新运动，更主要的是慈禧身上代表的是顽固势力，是阻碍中国富国强民的一股

落后势力,慈禧太后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唐才常将她称之为“逆后”,发誓要把她拉下马。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唐才常也有他自身的认识,虽然他在自立军起义前曾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一贯主张中日联盟,但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他还是表示了深深的痛恨,称他们是一帮不请自来的“恶客”,在中国的土地上敲榨吸髓,无恶不做。唐才常所反对的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他的活动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是进步的。

其次,唐才常的自立军与革命派的关系不是互为敌人,两派之间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是相互合作的。革命党人为了唐才常能在长江流域起兵,特将他们在那里的关系全部转告给唐才常。孙中山十分光明磊落,当一些兴中会员回国帮助自立军起义时,他特意吩咐不要存党派、地域的偏见,尽全力帮助唐才常,唐才常的部下感慨孙中山“筹谋赞助,极是周到”。自立军对孙中山十分敬重,遥戴他为“极峰”,正因为自立军与兴中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革命派始终承认自立军起义是一次革命,并尊唐才常为革命烈士。

第三,自立军的失败对革命也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在自立军起义前,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迷惑于康有为身上耀人的光环,对康有为保皇主张的实质难以认清。通过这次起义,许多人看出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是没有前途的,而康有为对唐才常背信弃义的行为也使康有为的追随者看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从而与其划清界限。自立军领导人秦力山在起义失败只身逃亡东京后,断定康有为不忠不义,宣布与之绝交,转而投身革命,成为革命派阵营中的一员干将。另一个领导人陈犹龙在事败逃到日本后,扬言要找梁启超算帐,天天带一群人上门理论,搞得梁启超不胜其烦,只得从东京躲到了横滨。可见,经过自立军一役;康有为的保皇会已“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而康有为的人品也遭到知情人的唾弃,这样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认为“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革命与改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终于辩出了高下,分出了泾渭。革命与改良从此站在了不同的战线上,变成了对立的两派,1901年革命与改良派在东京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使这条两派之间的鸿沟变得更深更宽,革命派从此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领航人。

改良派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时曾经是领潮者,是进步的,但是当时代走到了已经证明它的主张行不通而为了一己私利仍死抱住不放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时代的绊脚石。所以进步与否都是相对而言,不是说因为它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就一定是落后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学习历史时所要注意的问题。

中国近代历史告诉我们,虽然各个帝国主义将中国视作一块难得的肥肉,不断要分割鲸吞我国,不断地逼迫清王朝让步,最终变成它的“管事”,中国人民在富国强民的路上,横亘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屈服过,他们从侵略者踏进国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反抗,有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探求解救中国之路。像唐才常这样,从读书时代起立志要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学习外国的新思想,投身于改革中国的实践,并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民族优秀的一员,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尽管中国近代不乏唐才常那样只要能够救中国,粉身碎骨也不怕的仁人志士,但遗憾的是中国近代始终也没有摆脱沉沦的命运,他们的理想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毛泽东曾经总结过,近代中国不能振兴不外乎两点原因,一是

陈腐的社会制度，二是落后的科学技术。像唐才常那个时代的先进分子，囿于各种偏见，还没有勇气提出来推翻封建主义，他还只能幻想有一个好皇帝能出来改造这个制度。即使是孙中山最终推翻了清王朝，但强大的封建势力仍将孙中山的一世心血毁于一旦，中国不仅没有能够走向富强，反而引来了更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只有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才使中国人民最终摆脱了缠绕我们 100 多年的恶运，中国人民开始得到了新生，终于可以自豪地喊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今天的成果确实来之不易，是几代人的共同奋斗的成果。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它建设得更好，以告慰无数的先行者，让他们含笑于九泉。我们了解历史，不在于回忆过去，更重要的是开创未来。

